

上篇 理论篇

第一章 绪 论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变异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变异的特征和中国的“全球化文化想像”

1992年10月24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日”的一篇致辞中郑重宣布：“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虽然当代所有国家几乎无不把视角对准了现今世界这个最重要的国际现象——全球化，当代人也无人不使用“全球化”这一新潮词汇，但是对全球化的理解和概念的选择却各自不同或相去甚远。

我们所见到的关于全球化的典型看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意见认为，全球化即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全球化即西方文明化，如菲利浦·英格哈德就宣称：“全球化无疑是西方现代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有的公开宣称“西方世界可以使其他欠发达地区文明化”，但必须依靠“征服和扩张”，加上将西方“价值观向这些地区的扩散”，才能使“第三世界从不发

① 菲利浦·英格哈德：《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理》，1993年巴黎版，转引自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第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达阶段成长到资本主义民主、富足和大规模消费阶段”^①。显然，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可能接受这种资本主义一元论的全球化“第三世界文本”。这类观点把全球化看做是冷战后意识形态的终结，看做是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同步过程，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各国全盘西化的过程，认为发展中国家将全面沿袭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制度文化模式，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大众文化与娱乐方式，都将与西方国家一元化，这便是他们的全球化景象。

另一种意见强调全球化是经济技术资源的全球化传播流动和全球范围相互依存的增加，即强调全球化的经济内涵。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1997 年 5 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说：“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增强。”这种观点强调的第一个层次是全球化的三个重点领域，即跨国商品、服务贸易和国际资本的流动；强调的第二个层次是这些领域的规模增加、技术广泛传播而相互依存增强的一种全球运作机制。

再一种意见则较强调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即全球化的文化内涵。如有的海外华人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情形。全球化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潮等各个领域，文化与商品的密切结合，渐渐形成了充满着内在矛盾与悖论的‘全球化文化想像’。”并认为全球化文化想像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有关中国的种种图景，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文化想像

^① [美] R.H. 奇尔科特著《比较政治学理论》中译本，第 296 - 297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 年世界经济展望》，第 45 页，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7 年版。

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现代化”这个压倒一切的中心话题。同时他针对全球化文化想像的“历史终结论”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元决定论提出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问题，认为：“在全球化格局下，多元选择的机遇空前，但与此同时，全球化文化想像所传播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元决定论，在中国文化界、知识界的确形成了某种思潮，不断激荡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我们仍需要从历史发展的多重矛盾和多元决定的角度，拨开以‘多元、多极’的话语来掩盖市场万能、资本主义万能的一元决定论的种种迷雾，来寻求与创造现代化的不同选择。”即：主张应该不断追问现代化不同选择的问题，而不应不加批判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当成绝对和普遍的标准。

我们认为，第二、第三种对全球化的阐释即使不一定十分准确，但还是有比较科学的内容的，尽管生产、金融、科技的全球化传播的内容、方式以及全球“世界系统”、文化全球化传播与选择的内涵等等都还有待在发展中明确，但总体说来还是反映了较为符合现实的全球化状况，并较易为不同制度国家和人民所接受。而第一种观点把资本主义全球扩展和西方文明这类全球化中的一个方面的表现，哪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等同于全球化的惟一真谛，在我们看来，则是对偌大一个地球上不同体制的国家、多姿多态的其他文明的估价过低，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的一元论。我们认为，只有反映现实的理论才能有生命力，全球化只能是这个多元世界追求全球的协调化运作机制的世界系统化，而非以某种体制与文化为模式的一体化，尤其是当今世界多种文明和多元制度也不可能完全一体化。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因异化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或其帝国主义国家的灭亡而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会因其部分国家的霸权主义发展或专制主义膨胀造成的失败而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不同制度国家在全球化中将以不同的方式运用市场经济、国际资本，学习他国制度

① 刘康：《全球化/民族化》，第4页、第1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与 他 国 文 明 之 长、进 行 切 合 本 国 实 际 的 改 革、创 新 和 新 道 路 的 选 择，并 丰 富 世 界 现 代 各 种 文 明。现 代 文 明 中 有 西 方 文 明 巨 大 的 贡 献，但 也 绝 不 等 同 于 西 方 文 明，其 中 也 有 世 界 东 西 南 北 各 国、各 种 文 明 优 秀 文 化 的 共 同 创 造，西 方 文 明 以 外 的 各 种 文 明 对 人 类 文 明 的 贡 献 是 永 远 无 法 抹 去 的。

我 们 主 张 对 全 球 化 的 内 涵 给 予 更 加 宽 泛 和 更 加 全 面 的 定 位。其 一 是 似 应 包 括 经 济、文 化、甚 至 政 治 等 各 个 领 域，即 除 了 前 述 国 际 资 本、跨 国 商 品 和 服 务 贸 易 外，除 了 协 调 发 展 通 讯 网 络、生 物 工 程 等 高 新 技 术 外，诸 如 治 理 贩 毒、艾 滋 病 以 及 全 球 气 候 升 温 等 等 社 会 文 化 问 题，均 可 合 理 纳 入 全 球 化 内 涵 中，纳 入 全 球 化 运 作，甚 至 包 括 政 治 方 面 的“反 恐”、反 对 极 端 民 族 主 义 行 动，也 需 要 全 球 范 围 的 理 解 与 合 作；其 二，正 因 为 全 球 化 涉 及 的 领 域 和 内 容 如 此 的 纷 繁，特 别 是 涉 及 到 不 同 文 明 的 多 元 文 化 和 不 同 立 场 的 多 元 政 治，则 全 球 化 的 运 作 机 制 将 会 是 在 协 调 与 矛 盾 中 发 展 的，即 在 全 球 化 过 程 与 其 悖 论 的 矛 盾 过 程 中 追 求 协 调 化 发 展；其 三，这 个 多 极、多 元 的 世 界 只 能 追 求 全 球 系 统 的 协 调 化 运 作，而 不 可 能 达 到 某 种 政 治 体 制 和 某 种 文 化 模 式 的 一 体 化，一 元 化。所 以 我 们 认 为：全 球 化 是 世 界 各 国 的 政 治、经 济、文 化 以 及 各 种 文 明 的 不 同 民 族 与 人 民 不 可 避 免 地 处 在 全 球 这 个 大 地 缘 环 境 中 进 行 运 作 的 一 种 当 代“世 界 协 调 化 系 统”，是 其 相 互 的 协 作 与 依 存、相 互 的 传 播 与 影 响 空 前 增 长、全 球 运 作 的“世 界 系 统”在 协 调 与 矛 盾 中 逐 步 形 成 发 展 的 当 代 世 界 的 情 景，也 就 是 说，只 是 这 个 多 元 多 极 世 界 追 求 协 调 化 运 作 机 制 的“世 界 系 统 化”，而 不 可 能 是 资 本 主 义 或 其 他 内 涵 的 一 体 化，即 全 球 化 的 实 质 是 协 调 化，而 非 一 体 化。不 过，前 述 三 种 观 点 都 从 某 些 方 面 不 同 程 度 地 指 出 了 全 球 化 的 各 种 主 要 内 容，而 我 们 则 强 调 全 球 化 应 是 经 济 与 科 技、文 明 与 文 化 全 部 内 涵 的 全 球 化 趋 势。

在 这 种 全 球 化 现 实 情 景 下，各 国 的 文 化 必 然 呈 现 一 种 文 化 选 择 与 文 化 变 迁 的 时 代 特 征，呈 现 适 应 全 球 化 和 本 国 现 代 化 的 新 特

点、新趋势。顺便说明，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指大文化，这区别于只指精神文化、思想文化的小文化概念，大文化的文化范畴，一般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至于我们所说的文化选择和向他文化、他民族方向的变迁和变异，是指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选择和变迁，也包括社会制度、文明传统、科技文化的选择以及生活方式等大众物质文化的变迁等等。

中国的文化道路选择和世界各国的共同性选择，在我们看来，首先都应该是选择向世界现代文化、先进文化变异。全球化推动文化国际化，不同的区域文化圈由彼此接触而彼此学习，由彼此学习而彼此共同化加强。

有的学者提问，新时代的全球文化想像、亚太地区文化想像后面的跨国资本，是否能为中国“与国际接轨”而衷心庆幸，是否会把“权力与金钱拱手奉献给中国”，究竟亚太地区文化想像中的 21 世纪的中国，会是“世界新秩序里的新富豪”，还是会被跨国资本作为原料来源地和牟取利润的“第三世界市场”？这需有清醒的头脑。我们对这些孜孜不倦地求索着的人们，无论是被称为中国当代的“后学”们，还是“中华性”的作者们，或是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和“中国不同选择道路”的倡导者们，都深怀敬意，因为他们启迪着当代中华的一代新思潮，包括启迪着我们这些普通的专业学者，虽然我们往往喜欢用普通的、熟悉的词汇“中华现代文化”来表示中国当代的全球化文化想像。“现代文化”表示与世界现代先进文化的共性追求，而“中华”文化表示继承中华文化精华与民族特性。共建“中华现代文化”去适应全球化，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同”特性

① 大文化是目前世界上已普遍认可的广义文化定义，即“文化是赋予一个社会或者社会群体为特点的那些精神的和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的特征的完整的集合”。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们比较赞许加拿大学者谢弗的归纳：“文化一般是指物种，特殊地是指人类观察事物和感知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事物，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把自己安置在世界上的那种方式”（引自闵家胤：《西方文化面面观》，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 年 2 期）。

选择。其实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文化选择与改造，创造出现代的适应世界化的民族文化。一方面要看到全球化对中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中国有特殊的文化现实和文化前景。我们回避“中华性”关于中国要成为一个“有限中心”的提法，但对于其“在世界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中国形象，在世界的话语中确立自己的话语。该学习就学习，不求与他人同而不得不同，该独创就独创，不求与他人异而不得不异”^①，这类精神，与我们的“中华现代文化”的思路是一样的。

中国应该会有自己的“全球化文化想像”的选择，并构建中华现代文化型的文化社会结构。面对全球化的新世纪，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文化思潮，自然都无法与全球化的话语分开，而且正在促进中华文化的理性变迁趋势。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文化反思，90年代的“人文精神”和中国“后学”对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文化想像这一巨大引力场中的位置的研讨，以及海内外华人学者提出的中国全球化文化想像“不同选择”、“中华性”、“民族性”等等话语，尽管或不甚明确，或尚存争论，但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所起的启蒙当代中国一代新思潮的积极作用。江泽民同志近期反复强调新世纪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贡献，我们认为，面对全球化纷繁复杂的新特征，如何寻求适合中国实际的文化新视野、新抉择，研讨中国在全球化文化想像中的选择，正是这一主旋律的实质性问题之一。

第二节 当代文化变异的时代特征与构建 中华现代文化社会结构

全球化同时造就了当代民族与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特点之

^① 刘康：《全球化/民族化》，第56页～5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一是民族文化向普同的大众文化变迁，普同文化、大众文化日益取代民族文化的地位，文化日益呈现共同化的趋向。如在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层面，从牛仔裤到摇滚乐，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趣味与追求流行全球。美国著名政治家布热津斯基指出：“如果说，罗马帝国奉献给世界的是法律；大英帝国奉献给世界的是议会民主；那么，美国奉献给世界的就是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又称通俗普同文化。美国大众文化涵盖甚广。以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为代表的餐饮文化，以圣诞节、万圣节、感恩节为代表的节日文化，以迪斯尼乐园为代表的娱乐文化，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影视文化，以摇滚乐、爵士乐、乡村歌曲为代表的流行音乐文化……所有这些无不属于西方大众文化的范畴。当然，东方民族文化也在不断转化为世界普同文化，不断丰富世界大众文化的内容，如日本的汽车文化，中国的中医学文化、茶文化等等。

自然科学的共同化已成共识，当代，一般已不分西方的自然科学或东方的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共同化则比较困难。不过，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越来越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但因地区、国家和阶级的利害、矛盾，社会科学共同化进展比较慢，其发展前途也可能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共同化和求同存异，而另一方面则是不同国家的主流文明底蕴决定了有不同的发展道路选择。中国的五四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这就是中国初期参加现代文化的宣言。现代文化不是某一国家的专利，而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财富。起初西方国家的贡献比较多，现在东方国家也越来越多地作出贡献。现代文化是全世界“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

日本学者提出“科学中心转移说”，认为科学成果超过全世界25%的地区是科学中心，并认为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中心的所在地不断转移。谁先进、谁落后的原因复杂。但是如认为有谁注定能永远跑在前面，那是不科学、不现实的文化想像。现代文化是科学革命之后自然地形成的当代现实，不少人还没有充分估计到它存在的意义。中国长期封闭，厚古薄今、抵制西化的观念

根深蒂固，东方与西方对立的观念在各种问题上仍会有残留。但时代改变了，这种认识也需要改变。现在再谈什么中国文化中心或东方文化将转而统治 21 世纪，实在是可笑的。统治 21 世纪或未来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融合有东西方先进文明的世界共同认可的世界先进现代文化。

现代各国的生活习惯相互靠拢，如同航空往来需要有共同的飞行规则，电信交流需要有共同的互连网络，克隆基因研究需要有共同分工和制约一样，现代文化在全世界的共同化趋势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但现代文化的产生，不等于各国不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消亡。符合世界潮流的传统文化将与现代文化并存。从整个世界来看，共同文化之外必然还有多元文化。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来说，既允许保留本土的特色，又为参加全球的共同文化发展而需要适应与改造，特别在全球化的文化领域更是如此，即多元文化在交流中改造、多元文明在取长补短中相互适应与共存。21 世纪是不同制度、多元文明求同存异、适应发展的时代。

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特点之二，即当代文化变异特点的另一面却是与全球化的悖论，如文化的多元多极与分离分裂的趋向。这又一方面表现为各国民族文化的新崛起、新发展，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所谓“东亚模式”、新儒学、伊斯兰革命等。还有近年来，西方的“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多样性（diversity）”和“差异（difference）”理论也极为流行。我们认为，这种文化的多元多极发展，是当代多极政治的必然反映，只要与和平民主的全球化主流相适应，便会有其生命力。但特别令人遗憾和困惑的是，种族、宗教、地域方面的各种狭隘民族主义利益集团也在多元多极的幌子下，民族分立主义的呼声日益升高，后者这些地缘文化的各种话语与地缘政治方面的民族分裂、分离主义倾向，已与全球范围的极端民族主义区域化、分离化的逆流相互呼应，成为当代民族主义潮流中不可忽视的逆流，并与世界和平民主的全球化发展主流发生尖锐矛盾。同时，使问题更加复杂的另一方面还在于，以“市场万能”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全球化文

化想像，在强调多元多极、兼容并包的同时，却又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趋向，即意欲将一切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选择，不同于“市场万能”神话的观念、理论与实践，统统用各种理论与手段加以解构或消灭。这就加深了其他多元文明与这种全球化一元论观念和行为的某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以上这些都成了国际地缘冲突频繁及国际关系复杂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衡量是捍卫本民族利益的正义民族主义还是只顾集团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逆流的基本原则，主要应该看是否违背和平民主与正义的世界全球化主流，是否遵守国际社会制定的和符合广大人民和平利益的准则。

当代文化变异的特征在中国也会有类似的反映，就是说，全球趋同的文化商品化和逆全球化而动的文化的政治性变异同样会发生。在这种时代特征下，我们主张，要发展与创造“中华现代文化”，为此应该先从构建社会文化结构方面起步，这或许比议论抽象的中国“全球化文化想像”更实际一些。我们认为，中国的全球化文化想像当前的原则任务就是吸收古今中外众说之长，构建中华现代文化的发展框架。这里，根据当代文化与社会是两个不可分离的领域，并互为构成的社会文化结构理论^①，我们先提出我国急需构建的四层次文化社会结构。

第一层次文化社会结构是中国需利用市场化机制，构建融入全球化国际社会的开放性全球文化通道结构，要吸收世界普同文化并同时输出中华各族优秀文化，参与全球化竞争，以实现现代性对传统社会的挑战和变革。面对前述全球化时代特征，必须深刻认识到全球化最本质的问题是文化与市场化、商品化的关系日趋紧密。从好莱坞、肯德基这类影视、饮食大众文化，到全球网络信息文化，以至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文化等等先进普同文化，无不以排山倒海之势，追求占领全球更大的市场和获取更大的利润，因为这与增强综合国力和经济基础紧密相关。而当今世界的

^① 萧俊明著：《文化与社会结构》，载《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5期。

游戏规则实际是“权力分配最终取决于经济基础”，离开经济实力，谈不上中华复兴，更谈不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我们反对那种以丑化民族文化、丧失文化人格为代价，换取商业利润的商业化。我们主张挖掘并输出优秀的民族文化，除了中国的茶文化、中医药文化、古装丝绸文化、文物古迹文化等特色文化外，56个民族都有千姿百态的民族特色文化，可以通过影视传媒业、网络信息业、旅游业、文博业等途径转化为兼有民族性、学术性和商品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民族文化的经济力、文化力，使之融入全球化国际社会的市场化运作，并成为各族人民的致富手段之一。同时，应大力度地向各国、各地区开放这些文化产业的投资、开发权，促使其走向世界。其实，参与中国文化产业开发的国家越多，由于多国、多集团利益的相互交叉制约，更有利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而不致沦入被征服、被役使的“第三世界文本”，相反更有可能按照我国的“游戏规则”发展。

第二层次的文化社会结构是通过人的市场化的流动与社会化的教育，学习工业文化，以实现农业和农业社会向城市和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流动”就意味着进步，甚至飞跃。历代华人漂流国外，为祖国造就了无数革命精英和海外赤子，并冲破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枷锁。当代国内“民工流”意味着中国千年封闭的农业人口在接受社会化培训后，进入了工业和城市文化圈的一种社会进步。近年的留学生“回国流”又掀起了中国高科技开发热潮，意味着中国开放的成就和向国际化社会格局的迈进。但是，我国各阶层，包括知识分子的职业流动还是十分滞后的，而一生一世呆在一个地方的农民更何止千千万万！这种静止型文化社会结构不仅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发展，而且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更是

① [美] 罗伯特著：《世界政治的战争与变革》，杨宇光等译，7页，中国人民大学1994年版。

②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

十分不适宜的综观当代引起地缘冲突的狭隘民族主义、民族分立主义，几乎无不是以争夺长期定居的聚居区领土为目标的，将主权国家拥有的领土权力看作本民族主权领土的错误领土观念，是滋生民族分立主义的土壤；而发达的工业国家则恰恰是以移民之众和职业流动的频繁为特征的，因而也就较难有滋生这种错误领土观念的土壤。美国印第安保留地还相当滞后，而走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却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与经济生活，并逐步融入现代社会就是明证，这在全球范围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例证。因此，世界各国后进民族为了发展必将选择“流动”。这当然不是要求中国十几亿人口作全国性流动，而是至少应合理建设农村和民族聚居区附近的工业城区，用市场化原则和政策促进近距离城乡流动，尤其是先进与落后地区的互动。通过人口（包括各民族人口）的合理流动促进封闭型文化向先进现代文化变异，从而逐步构建起现代型文化社会结构。这种经济文化转型是各种现代化阶段理论所共认的必由阶段。

第三层次的文化社会结构，是国家应逐步构建不强调国籍、民族、地区等差别，而将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法律保障更直接地落实于个人的文化社会结构，以逐步实现多元文化、多民族社会的和谐共处与社会整合。我们认为，在这方面，美国的有些规定可以参考。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移民集团和跨国民族众多的国家，但在美国，民族特性不容许成为享有领土权或政治上单独享有任何管辖权的一种手段。不容许它变成政治组织的排他性手段，不容许成立以民族原则为基础的政党。政治权利属于个人而非民族群体。在这种国家政策的导向之下，现在不同族裔普遍杂居成了美国社会最显明的一大特色，即便存在一定的民族聚居区，也仅仅是“民族孤岛”而已，即普遍杂居下的相对集中。往往是习惯形成的某城镇一条街或某一居民区（印第安人除外），比如旧金山、洛杉矶的唐人街，纽约、新泽西的意大利人区。新移民往往也只把这些街或区当做初期的落脚点，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很快就会使他们为生存、发展而四处奔走，散落到全国各地去。民族间通婚变得极其平常，华裔中族外通婚者的比例也

相当高，女性达半数以上。民族经济的概念变得难以理解。事实上，在这里民族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意识的存在，国家极力淡化民族，并依靠市场经济和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来整合政治文化，保障民族个人的经济利益，自然淡化民族的集团权力。这看来是美国的民族政策和社会文化结构的优点，也是不同制度国家都可以借鉴的文化社会结构模式的一个方面。

第四层次的文化社会结构，我们在以前出版的著作中已经提出，即中华经济文化圈结构。简言之，即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但无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如何发展，任何国家必须在享受全球经济成果的同时，构建一种保障国内市场与本国各族人民整体利益的经济文化模式，一种有利于本国政治长期稳定、经济超越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当代发展中国家，更应研究构建这种经济文化基础和结构。中华民族在历史形成过程中之所以虽屡经分裂，但又总能奇迹般地实现再统一，表现出很强的凝聚力，我们认为，这与中国历史上潜存着一种中华经济文化圈有密切关系。

经济文化圈是不同的资本中心市场、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等许多复杂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存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圈，对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民族的发展方向、对民族与国家的凝聚或分裂有重大影响。例如，欧洲从统一的庞大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的欧洲民族国家和不同资本市场的过程，就与当时资本市场形成多个中心，语言、文化变异加剧而形成许多个不同的经济文化圈有密切的关系。而今天，欧共体这一地缘板块却是又向一个共同的经济文化圈发展。历史上中国西部、北部主要为畜牧经济，它对中原和东南沿海的农业产品像粮食、茶叶等和工业产品像丝绸、布匹等有很强的依赖性，也有一定的互补性，这是历史上中华经济文化圈的经济共存基础；而汉文明对游牧民族的吸引

① 参见《华人》月刊，1982年第2期，第10页。

② 详见马曼丽：《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研究》，第45页～58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也可参见马曼丽、冯瑞：《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西部大开发》，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与辐射力，农耕文化当时的先进性以及需要与游牧文化尚武精神的互补，则是中华经济文化圈的文化共融基础。虽然其互补性不尽对等，但被中央王朝的治边政策和中原王朝自上而下的分封、赏赐、官贸及边疆对朝廷的朝贡、遣使等政治经济模式所弥补，从而形成了南北互补共存的结构。中华各族“共生”在中华大地上的历史，已从实际上证明了中华经济文化圈将中华各族和条件差异极大的南北地区整合在中华大地上的重大功能与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东西差距在拉大，游牧畜牧经济对内地的互补性也日益减弱，原凝聚的中华经济文化圈的互补共存的经济基础正在削弱。因此我们认为，必须依靠全国，主要是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形成国内地缘组合，支持西部大开发，发展中华新经济文化圈。然后逐步依靠香港、上海、深圳、台湾等东部发达地区的协作走向世界。以东西部协作为重点，构建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现代经济网络，它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足以形成一种网络经济的文化圈格局。其内容不仅应包括边疆与内地资源互补、科技文化协作、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而且应包括诸如通过义务教育进行全国边疆与内地的观念沟通、文化互融。通过中华东西南北各地的资本协作，建立资本运营网络，以及互设连锁公司、跨国公司等等，用优惠政策促进形成互赢互补关系，在这种基础上，携手参与国际竞争。

最后，我们认为，还应构筑与中华海外赤子和跨国民族的境外亲友间的中华外围经济文化网络结构。只要是中华各族的后裔，不管他们入了何国国籍，只要他们愿意承认华裔血统，尚有中华民族感情，我们就应该把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血缘后裔和中华海外儿女，与他们建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通过华裔儿女走向世界，永远是一条康庄大道。

总之，如果我们以市场化为动力，吸收各国之长，逐步使我国原已定型的某些不尽人意的、不适应全球化、现代化的管理体制稳妥转型，那么，是可以逐步构建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华现代文化型社会文化结构的。我们也相信，只要按照江泽民同志所说，将“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和“中华民族的优

秀文化传统”，“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发扬”，并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精华部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中华民族必将在“全球化文化想像”的竞争中，迅速成长壮大。

第三节 本书的智囊价值与学术价值追求

正是基于前述全球化时代文化变异现象错综复杂的实际，以及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正处于构建现代社会文化结构的重大转型时期的实际，我们对文化变异，尤其是包括跨国民族问题在内的政治亚文化变异，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因此，这套“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研究丛书”中，专辟出本书《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以整整一部书的篇幅，环绕跨国民族这一民族现象，从文化视角出发，以史论结合、历史经验教训与当代现实结合、国内外跨文化比较等手段，按上、中、下三编进行综合研究。在我们看来，本书提出的中心论题——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特别是其政治文化变异及相关问题，对跨国民族问题此起彼伏的当代世界、对拥有三十多个跨国民族的当代中国，以及对向往和平跨居的广大跨国民族和族群，都具有重要的关注价值。

本书这个论题应属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范畴，或者说人类学、民族学的交叉学科范畴。需要着重指出，随着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展范式”理论的兴起，国际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发生了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的重大时空变迁。其一，其研究对象从固守“野蛮的”、“前近代的”民族文化为主，转向研究“现代时”社会文化的重大变化。人们不仅关注“边远的”、“非主流的”、“第三世界的”民族及其异国风情的传统文化在怎样地与全球潮流融合，而且开始研究诸如西方本土工业社会的主流文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

化、社会结构、不同“发展”观念中埋藏的意识形态冲突、移民的地方维系以及民族性与民族主义等等这类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性”热点问题，遂使西方人类学被称为是“规划人类现代世界的高妙学科”，并使之从一度萧条的危机中重获了生机。文化人类学的这种变迁推动着它与其他现代应用学科的结合，而开始出现豁然开阔的发展前景。比如，由于人类学的这种对现实热点问题的研究产生的智囊作用，国际社会的智囊团中，人类学家遽增。以“面向穷国”的世界银行为例，1974年仅一名人类学家，近年已增至二百多名人类学家轮流参与工作，真是盛况空前！这也启发了我们对本书内容的智囊价值的追求。因此，我们从理论上和实际史例中都关注文化变异，特别是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的特性、复杂性、可变性、可构性，关注地域、民族、宗教的“非通体同质”的特殊性构成与亚文化特质；探讨世界与中国的“发展”与“多元共存”的模式，跨国民族的和平跨居与国际地缘冲突的类型；揭示历史上有的民族内徙和外迁这种相背异向发展的原因、经验教训等等，追踪这类古今中外有关问题的踪迹。尽管水平有限，我们还是期望能为祖国56个兄弟民族带着自己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谐地进入现代化，起一点智囊作用；能为这56个兄弟民族肩并肩地、和和乎乎地融入全球化国际社会，献上一点民族学者的关切之情。

另外，根据国际社会对社会科学评价的规范化要求和民族学学科的求实性特色，本书作者也怀着学术价值的追求，即追求科学性的预期目标。一般认为，科学性的基础主要取决于是否能把握真理性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结合。真理性标准的一般要求，是理论看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现象的本质，或者是在已得到确认的原理、假设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而成果的价值性方面，除了我国常用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以外，还应具有或对

①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第371页，载《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